

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及其异同：马克思和凯恩斯^{*}

王璐

摘要：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转换经历了多次更迭与交替。与居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地位、以强调技术关系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范式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基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博弈规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殖；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剖析，马克思和凯恩斯强调了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质，并表明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根源。相反，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理论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竞争的分析框架，其异质品模型的加总悖论直至20世纪50-6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公布于众。从范式意义上讲，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都是对主流理论的一次思维范式的革命，它们各自确立的经济学体系都通过对新古典理论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这正是其经济学革命之共同意义所在。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 马克思 凯恩斯 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似乎有很大差异，这里的关键在于，经济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经济理论的发展总是与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其中，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制度的更替演变是影响经济理论变迁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更使得经济学不可能脱离“辩护”的轨道而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自1776年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前后经历了古典学派、马克思经济学、新古典理论、“凯恩斯革命”以及凯恩斯之后不断演化的各种凯恩斯主义(如新古典综合、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理论体系的变更。当然，各时代居于正统地位的经济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是不完全相同的，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是由于人们研究对象和研究的问题发生了变化。如1870年左右边际革命的兴起，使得关注于技术分析的新古典理论取代了一直将社会关系作为研究主线的古典经济学而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范式，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古典经济学似乎又复活了(如后凯恩斯学派对古典剩余传统的复归、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发

展等)，从而形成了经济学领域两大范式并存和对抗的局面。其中，分别作为20世纪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的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在各自不同时代经济学范式的革命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今天，重新探讨两位经济学巨匠在范式转换中的理论渊源，对于我们能否联系到客观实际来发展和改革经济学内容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转换

回顾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分析的发展历程，经济学纯理论的争论经历了多种分析范式的更迭与交替。可以总结为两种传统的对立：一种是古典剩余传统的“社会关系”分析，另一种是新古典供求传统的“技术关系”分析。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古典经济学始于英国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斯密运用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表示市场经济的自动协调机制；之后，李嘉图追随斯密通过使用统一利润率的竞争规律和资本在各部门间的转投来说明这种古典均衡的实现机制。

1867年《资本论》第1卷问世，在批判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总量理论体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

*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05JL001)的资助。

关系,而劳动价值论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首先抽象掉技术关系而把价值归之于劳动时间,马克思表明了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基础或来源。该抽象法明确表述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正是我们今天理解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命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即相对价格与技术选择无关、而只是由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动机所支配,从而导致了围绕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为核心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而产生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这种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或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关系出发,马克思建立起一套“宏观经济体系”,其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与周期理论无不是建立在这种总量关系基础之上,从而被著名思想史学家熊彼特称赞为“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在马克思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中,其核心是要说明有效需求或利润率下降问题,通过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分析,马克思将其联系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性质。可以说,正是在对价值、剩余价值和收入分配一系列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发展了他的解释性理论以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其探讨的问题正是半个世纪后凯恩斯理论所表明的。后来,马克思这一强调资本主义研究不能脱离资本与利润关系的分析方法,在后凯恩斯学派、尤其是斯拉法那里得到了复兴,通过在投入-产出矩阵的基础上加入表明特定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来决定价值与分配,从而令古典经济传统日臻完善。

然而,1870年前后发生的一场被库恩称之为“范式革命”的边际革命却使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逆转,即完全抛弃了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以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总量分析,而转向了以一套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纯粹技术关系分析,并使用静态的瓦尔拉斯新古典一般均衡取代了由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所表述的古典一般均衡。这样,到马克思《资本论》第2、3卷经由恩格斯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整理发表时,经济学界已被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为代表的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新古典相对价格理论所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支配经济学研究已超过一个世纪之久的新古典理论,完全可以称作是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但这种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理论的转变明显存在着经济学领域对自身研究问题的转换,它完全排除了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只是关注于技术关系的分析,其缺陷在于无法真正解释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各种总量关系。特别是,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命题极为狭窄,它所讨论的仅仅是给定资源和偏

好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但是对古典学派如斯密一开始确立的经济学应探究国民财富增长的性质和原因、或如李嘉图坚持要研究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抑或像马克思明确表示要研究和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等问题却毫不关心。显然,就经验观察、甚至仅仅依赖于直觉也不难发现,新古典理论的一系列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经济相距甚远。一个典型例子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的“完全竞争”,因为新古典竞争表明的是市场参与者在通晓各方面信息基础上的一种合作,即竞争不具有任何个人利益上的冲突;相反,真实经济中的竞争必然要联系到作为其本质特征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基于信息技术的垄断、相互之间的竞争博弈等。显然,新古典理论必须解释而又无法解释的主要事实正是这种现实。

随后,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29-1933年)几乎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无情地揭示了主流新古典理论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解释力的匮乏,同时也带来了另一场经济学分析范式的革命——“凯恩斯革命”。1936年,在经历了“长时期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之后,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该书在标榜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全新概念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宏观经济体系,用来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等问题。在《通论》一开篇,凯恩斯就明确指出,“古典学派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结果,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实际上,“凯恩斯革命”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由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借助于这种范式转换,凯恩斯开创了现代宏观总量的分析方法。他认为,总需求不足、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和古典二分法的失效是经济运行中的一般状态,而新古典理论描述的只是一种极端特殊或理想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凯恩斯暗示了一种强调有效需求作用对积累的分析,比如在固定资本品结构进行调整的增长中,经济所遵循的稳势受到有效需求水平的影响,从而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问题。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现代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问题,这促使他在《通论》中使用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和货币的灵活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表述这一核心问题,并由此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与波动。

毫无疑问,凯恩斯在《通论》中要完全否定新古典理论和建立一种新的范式,如凯恩斯表明的新古

典理论仅是他的一个特例。然而,新古典学者对其理论的种种缺陷视而不见,相反却在无视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函数技术分析上越走越远。20世纪50-60年代,帕廷金的《货币、利息与价格》(1956)和克洛尔的《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1965)两部著作的问世,更是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于瓦尔拉斯新古典一般均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则与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即理性预期学派)开始融合,从而把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索洛增长模型的基础上。由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倒转了,即凯恩斯经济学成为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应用经济学。在这种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中,资本被视为一种代表实物资本品的生产要素,而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都只是实物的符号,即完全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来解释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各种宏观变量。正是基于这种总量的生产函数,主流理论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嫁接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理论套用中出现的宏观经济学的严重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问题、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问题,就给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带来了沉重打击。

可以说,主流新古典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基本假设并不能表明现实市场经济的性质;相反,作为一种分析范式,从假设前提、理论体系到研究方法的确立,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都完全不同于主流新古典理论,尤其是他们的理论发展都能够直接联系到现实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那么,两位学者之间究竟有没有一定的理论渊源?或者说,作为后来者,凯恩斯究竟有没有阅读过或试图了解过马克思呢?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一书中,曾经详细考察过凯恩斯对马克思的研究。他们指出,在《通论》中,凯恩斯只有三处提到过马克思,而其论述的态度都是平淡的、甚至有些厌恶。比如,其中一处只是简单地承认马克思是“古典经济学”这一术语的首创者。第二处,凯恩斯描写了1820年以后经济学怎样成功地排除了总需求不足这一观点:“在古典理论得到最成熟体现的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教授的全部著作中,它(指有效需求)甚至一次也没有被提到过。有效需求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西尔维奥·格塞尔和道格拉斯少校的地下社会之中。”不过,因为格塞尔和道格拉斯都是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地位的货币异教徒,所以这当然并不是在奉承马克思。但接下来的情况似乎就更糟了。因为凯恩斯断言,

与马克思不同,格塞尔已经明确地否定了“古典假设”(即萨伊定律),而格塞尔这样做就使得马克思本人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变成了多余的;因此他的论著中就已经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所以,凯恩斯以并不十分肯定的口气得出结论:“在将来,人们从格塞尔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为多。”

可以看到,在《通论》中凯恩斯对马克思的态度基本上是比较排斥的,似乎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不过,稍微细心一点不难发现,正是在这三处提及马克思的表述中,已经暗含了凯恩斯对两人相似之处的默许。在经济学史上,西方学者对“古典学派”或“古典经济学”概念的分类,基本上都是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凯恩斯在《通论》的划分;可以说,两人在自己最重要的著作中都分别对同一概念作了区分。显然,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不论身处哪个时代,只要涉及到经济学范式的转换,那么古典剩余传统的分析范式无论如何都是必须涉猎的。另外,两人对资本主义有效需求的强调也是很多学者认可的相似之处,就像凯恩斯自己承认的,“不入流”的马克思的确对这一概念作过详细论述。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对抗的收入分配性质来探讨有效需求问题相似,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同样联系到由商品购买力表明的收入分配问题;而且,利润和以利润为核心的资本家投资活动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的产出、就业和长期波动。由此,作为范式批判的首要目标,两人都把萨伊定律作为自己分析的靶子。正如学者霍奇森所说,“对‘萨伊法则’的驳斥,仍然是马克思和凯恩斯两人的著作中重要的和有利的特点。”在此,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表明了一种与新古典理论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不同的态度,从而希望通过提出不同的理论体系和假设前提来更好地解释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

不过,就像一些学者指出的,虽然凯恩斯的《通论》是一部基于对新古典理论逻辑批判的著作,但它却不是一本组织很好的书。在《通论》中,凯恩斯一方面试图完全使用新的概念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但另一方面,他又试图通过对新古典的资本、就业和货币理论提出批评来进行补充和完善。显然,在凯恩斯的逻辑批判和他的新的理论之间具有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另外,与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明确的价值论基础——劳动价值论相比,《通论》的一个明显弱点是缺少价值和分配理论的基础,或者说无法回答市场经济中相对价格和分配是如何决定、以及与宏观变量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凯恩斯没有使用他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传统理论所讨论的价值、分配和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点,对于他把传统理论作为其新理论的一个特例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比如凯恩斯表

述的是,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仍然可以应用,这恰恰被新古典学者们作为新古典综合理论进行解释的主要论据。所以,凯恩斯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的头脑里还保留了一部分无法摆脱的新古典阴影。出于自身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信仰,凯恩斯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始终站在制度的高度来俯视和纵览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全貌,因而他所提出的强调政府干预的经济措施也不过是一种改良。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革命的范式转换并没有取得完全地成功,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凯恩斯去世以后各种凯恩斯主义的争论和相互指责。正像学者多布评论的,“作为一种实践学说,它(指凯恩斯学说)永远是一种‘挽救资本主义’或‘使资本主义正常运行’的学说。……它是一种本质上出之于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之大树的意识形态。”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货币经济

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分析的主线或者说一种框架和背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将是至关重要的,它甚至能够影响到该理论体系的逻辑推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凯恩斯具有非常相像的地方,甚至可以说,两个人理论最大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性质的肯定和应用。理解这一点,就像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力图构建的“货币的生产理论”所表明的,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绝不是如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仅仅作为一种交易的媒介而成为中性的;相反,货币不仅是重要的、内生的,而且也是决定所有经济关系的本质所在,整个宏观经济只有通过内生的货币供给才可以形成一个整体、进而决定所有的价值和分配变量。也就是说,当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均衡和效率时,就必须把货币经济的性质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假设。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讨论商品和货币开始的,进而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以此说明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获取收益(货币增殖)能力的基础。通过由简单价值形式 扩大的价值形式 一般价值形式 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而这个货币与实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联系到与使用价值或技术完全无关的价值形式。马克思认为,变成货币的商品进入流通之前已有价值,这个价值由生产货币所需劳动时间决定;货币一旦形成,商品交换过程就体现为商品流通公式“ $W - G - W$ ”,其中的商品单纯作为商品出现,而货币则单纯作为货币出现,即简单的商品经济形式。但是,当出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当资本家用一笔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时,他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

值,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货币的增殖),这时商品交换公式就成为“ $G - W - G$ ”,这种流通形态就成为资本流通的一般形态。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转化在这里就为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本家能够从中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货币时,他才有理由投资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这个增加的货币,即 G 与 G 的差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其货币表现即为利润,它构成资本家的收入,也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这样,货币的增殖、即利润就成为资本流通的推动力,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动力。可见,马克思强调的是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是为了不断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在现实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总量关系也就必然体现为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关系。

显然,马克思对货币经济的强调弥补了在马克思之前古典理论的不足。相比之下,在洛克、休谟和斯密、李嘉图的传统中,经济学的“货币的”和“非货币的”两方面是严格分开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相对价格被认为是在所谓实际的或非货币的领域内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货币的介入只是为了确定价格的绝对水平,即货币是一种“面纱”,仅仅是系统中的一种润滑剂和交易的媒介;而在旧货币数量论那里,货币也只具备交换媒介的功能,如果经济中货币的数量增加,其后果不外乎使价格、工资等比例上升,因而货币数量的增减对实际经济变量(如产量、实际工资、就业人数等)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仅能影响这些实际变量货币数值的大小(如产值、货币工资、就业人员的收入等)。换言之,货币的引入不会影响经济运行,即货币是不重要的。然而,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当然是至关重要和不可否认的;因而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不得不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货币,即现代货币数量论。但正如帕廷金证明的,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相对价格与货币数量之间不能保持齐次性关系;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中的货币仍然是附加的和无用的,所以货币论和价值论仍然是经济学说的“两张皮”。比如在货币论方面,从货币数量的变动去看价格的变动,即所谓的“货币面”;在价值论方面,由马歇尔所建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则从生产方面的实物经济出发、或从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出发,去探讨价格、产量、分配、进而是资源配置和相对价格结构等问题,即所谓的“实物面”。二者都仅从某一个角度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律,显然是不全面的,同时与现实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也是不符的。

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剖析相似,凯恩斯也极力反对新古典理论将资本主义经济人为断裂为实物与货币两方面的做法,比如他致力于重新塑造的“生产的货币理论”正是要冲破传统的货币数

量论。在《通论》中,凯恩斯首先将货币经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当研究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这些总量问题时,必须要有一个与价值论和分配论范畴密切相关的货币经济制度的完整理论,而并非一个与之相分离的货币论的范畴。从而指出,“经济学一方面分为价值论和分配论,而另一方面分为货币论,这种分法我认为不正确”^⑩。所以,凯恩斯试图否定新古典理论中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的两分法,以建立一种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或产出、就业理论联系起来的新的货币价值理论。同时,凯恩斯也强调了货币作为“联系现在和将来的环节”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就像学者迪拉德评论的,凯恩斯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忽视资本主义经济之金融经济的性质,而凯恩斯正是以资本主义的金融经济性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从而突出了货币经济的本质。^⑪而且重要的是,凯恩斯提出了一个与新古典实物利息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完全不同的一种利息率,即把“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来实现加总问题。在《通论》著名的一章(凯恩斯,1936年,第17章),凯恩斯以这个“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基础,从而把货币的信用关系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归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一点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对统一利润率的强调是一致的。这样,凯恩斯不仅驳斥了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而且强调了宏观经济分配中利润的决定只取决于对货币利息率的依赖。通过给定这个自然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即可以决定货币供给和收入流量,从而得到现实中的各种宏观变量(包括经济增长率、储蓄、投资、工资率等按货币价格计算和加总的统计资料)。显然,这些现实统计中由货币价格表示的宏观变量,只是一种表示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并不是与新古典生产函数所表示的同实物量值相一致的实际变量。

在“生产的货币理论”中,凯恩斯强调了货币对商品生产、尤其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意义。比如在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统计资料都是按厂商以货币为基础的成本收益得到的,由此厂商的行为目标和行为基础均以货币为导向,即为了追求货币利润的最大化。实际上,当货币成为对劳动的支配权和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价值尺度,而且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值时,这种总量货币价值的决定将与主流新古典理论的技术无关。相反,只有联系到货币以及由货币引起的市场经济的竞争博弈规则,才能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和竞争背后的逻辑。用凯恩斯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到最后比开始赚取更多的货币,企业没有别的目标。

这是企业(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⑫所以,只将货币视为交易媒介的新古典货币数量论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货币数量将决定价值总量,而货币数量论却完全否认存在一种货币价值总量和由总量表示的人们之间的分配关系,其中的货币数量完全是外生的。比如在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这种名义量值的大小无关紧要,即货币中性论;而一旦存在着总量关系,则名义价值总量的变动必然就会影响这种总量关系。相反,马克思所表述的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关系,正是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同时资本也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这样,如果假设存在一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利润率,则这一利润率必然是一个货币利息率;即当企业(资本家)计算的资本预付并不是实物的资本品和生活资料、而是货币价值时,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关系就表述为:如果利润率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必然等于这个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显然,这正是马克思和凯恩斯所表述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性质所在。

其实,霍华德和金后来也曾经指出,凯恩斯并非对马克思一无所知,也不总是对马克思持藐视的态度,而这一点正是表现在他们两人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性质的强调上。根据霍华德和金的研究,《通论》第一稿其实是写于1933年,而在该稿中,凯恩斯无疑是欣赏马克思的。正如凯恩斯所说,“合伙经济和企业家经济之间的区别,同卡尔·马克思所作的大量观察有某种关系,——尽管其后他对这一观察的利用是相当不合逻辑的。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并不像经济学家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如 $W-G-W$ 的情形,即把商品(或劳务)换成货币是为了获得另外的商品(或劳务)。这也许是私人消费者的观点,但不是商家的看法,后者认为是 $G-W-G$ 的情形,即抛出货币换取商品(或劳务),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⑬接着,凯恩斯指出他赞同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企业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依赖于生产预期的可获利性,而不取决于对人类需要的直接满足。显然,凯恩斯这里对资本家逐利本能的描述,无疑与马克思是相似的。就像霍奇森所说,“用一些同马克思完全协调的说法来解释很大一部分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是可取的。”^⑭不过,霍奇森对凯恩斯的理论始终未能与马克思的理论放在一起讨论而感到遗憾:“凯恩斯的说法同马克思的说法相似之处,是令人瞩目的。因此很可惜,凯恩斯始终没有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较量过。”^⑮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问题是市场经济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问题。就像马克思与凯恩斯对“萨伊定律”只

适用于物物交换的简单商品经济给予批驳一样,当经济的发展由于货币的引入及货币形式的不断完善而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时,他们也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当然,由于《通论》的全篇甚至核心正是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讨论,从而使得凯恩斯常常被视为有效需求理论的开创者,而马克思那里似乎并没有这一理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通过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等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马克思对有效需求问题的重视程度绝不亚于凯恩斯、甚至更为深刻,只不过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比较零散、同时也较为隐晦,从而增加了人们理解上的难度。这里要强调的是,在联系到资本主义现实经济来探讨有效需求问题上,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分析是相似的,因为他们的论述都涉及到了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性质,即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利润。

在马克思那里,有效需求问题正是来自于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即货币利润的追逐。在工业社会或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之前,由于竞争仍是统治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因而决定着经济剩余和占有剩余的存在,不过这里并没有货币量值的经济计算和利润率。由于封建地主占有的土地是一种特定资源、不可能通过投资再生,所以他们对剩余的占有只是为了消费,而不存在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当然也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有效需求问题。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储蓄的出现不仅是一种贮藏、而且来自于标志资本家社会地位的积累财富的欲望,或者说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竞争、即资本积累是由竞争支配的,这使得货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简单交换经济中,货币是一种方便交易的媒介;但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就成为一个价值符号、一种财富累积的象征,从而直接联系到生产的动机与决策。假定存在资本家的消费,当资本家雇用劳动工人为其提供服务时,这里不仅需要劳动者消费掉一部分剩余产品,而且还要为资本家赚取一笔利润;否则,利润实现不了、就会产生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不可否认,马尔萨斯也曾论述过这种有效需求问题,但他引入了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地主阶级来解决这一问题,即他认为唯一补救办法是维持地主的收入,只要地主把地租花在奢侈品的消费上就能保持有效需求的水平。显然,马尔萨斯忽视了马克思和凯恩斯所强调的资本家阶级之间以追逐利润为核心的竞争,所以当土地被资本化而使地主成为资本家时,马尔萨斯就无能为力了。这表明,对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必须要联系到利润,这与新古典理论“消费是生产最终目的”的说法并不一致。

当然,如果将马克思对有效需求问题的论述抽丝剥茧,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实际上散

见于他的整个《资本论》三卷,尤其表现在他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而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问题的相应分析,比如再生产比例的失调、利润率的下降、经济危机和失业等问题。按照罗宾逊夫人的总结,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可以发现三条清楚的思想线索。“第一,是失业劳动后备军理论,它表现失业如何倾向于随着对劳动提供就业机会的资本量和堪以使用的劳动的供给量之间的关系而变动。第二,是利润率下降理论,它表明资本家积累的贪欲如何由于资本的平均报酬率减低而陷于自相矛盾。第三,是资本货物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关系论,它表明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如何冲击着劳动者的贫困所规定的消费力的极限。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这三种理论是没有区别的,并且是融合在这个制度的一幅图景中的,这个制度为其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所折磨,产生了其本身崩溃的条件。”^①根据罗宾逊夫人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并未使用过“有效需求”的概念,但上述问题的讨论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也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供过于求(或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现象的剖析,即有效需求不足。而且罗宾逊夫人也指出,就像马克思认为的,出现这一问题的关键乃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显然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永远无法克服的困难。

1825年,英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大量工人的失业,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失业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②这是马克思讨论经济危机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加以批判的重要背景。通过大量分析和论证,马克思表明这种危机正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取利润。换句话说,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导致了技术进步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际上,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也就是由剩余价值的实现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而这一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计算和收入分配。采用古典学派与马克思的假设,即资本家的全部剩余价值(利润)用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则消费品部门(第一部类)的价值总量必须等于工资,资本品部门(第二部类)的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利润),由此构成一个简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其中,给定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则剩余价值率(收入分配或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将使社会再生产条件遭到破坏;而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的变动必须与两大部类的结构变动一致,否则就会产生比例失调和消费不足、从而引发危机。重要的是,马克思用资本主义为利润和积累而生产的性质表明了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他指出,如果假设利润用于储蓄、工人

工资用于消费产品,那么资本家得到的将是由资本品部门的产出表示的利润;再加入作为资本存量的不变资本,就可以得到利润率。进一步假定资本家的投资取决于一定利润率,则资本品部门的产出价值必须与不变资本加消费品部门产出的工资之间保持稳定比例、从而使利润率不变;而当资本积累的加剧使不变资本增加时,就会导致利润率下降。比如在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呈周期性变动,当收入分配导致相对价格扭曲时,利润率的下降就会带来经济衰退。马克思表明,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来自于按过去劳动计算的资本存量价值的积累与按活劳动计算的剩余价值流量之间的矛盾、即资本积累和为利润而生产的矛盾,而不是取决于技术关系。显然,这就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分析保持一致,即利润率下降或经济衰退来自于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或扭曲的收入分配,这正是产生资本主义有效需求问题的关键。

1929年,西方世界再次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次几乎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崩溃。受传统教条束缚而严格遵循萨伊定律的新古典理论无法对危机作出解释,自然也就提不出任何有效对策。1936年《通论》的出版,正是凯恩斯面对严重失业的经济大萧条而提出的对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标志着凯恩斯与新古典充分就业信条的决裂。在《通论》第一编,凯恩斯提出了他的有效需求原理,以后各章包括消费、投资、利息、货币和就业等等都是围绕这一原理展开的;可以说,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收入变动就是《通论》的核心。按照凯恩斯的分析,有效需求是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的交点,它是一个(短期)均衡点,而这一点来自于企业家利润最大化的决策,由此决定产出和就业。那么,这个有效需求如何决定呢?凯恩斯认为,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 and 投资需求组成;其中,消费决定于收入和消费倾向,投资决定于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与新古典理论不同的是,凯恩斯这里的消费不再是利率的函数,而是收入的函数,这样投资就可以通过收入影响消费,并通过乘数的作用最终影响国民收入。可见,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的各个变量通过围绕预期利润而变动的投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利润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凯恩斯首先强调了消费函数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重要性。正如凯恩斯所说,“消费——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和对象。就业的机会必然会受到有效需求多寡的限制。”^⑩可以说,这正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出发点。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新古典理论把消费依赖于表示时间偏好的利率的观点。他表明,现实中的利率变动

很少影响消费,从而提出消费取决于收入的消费函数理论,并着重强调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在这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意味着具有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不同的,其含义表明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储蓄倾向;而这一点来自于储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积累用货币价值表示的财富以表明所有者的成就和社会地位。显然,这种收入分配导致的消费不足与技术无关,由此联系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可见,凯恩斯的分析与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利润的追逐和货币财富的积累是相似的,这正是现实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事实。

同时,凯恩斯也表明了稳定的消费倾向对于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当然,由于消费倾向稳定,所以它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是由投资来实现的;因而,凯恩斯认为投资需求起着决定作用,即投资波动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国民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给定消费倾向,一个投资的变动将通过乘数使收入发生变动,并通过收入的变动使储蓄等于给定的投资;而当投资由利润推动、即资本积累基于利润动机时,储蓄将被投资决定。显然,这种收入-支出模型表明了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意义,即总收入取决于总支出,从而国民收入并不决定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而是取决于有效需求。其中,凯恩斯强调了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当投资量增加时,资本边际效率的递减会造成资本家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过低,从而失去投资的愿望和动机、以至减少收入与就业;同时,收入的降低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又会减少消费,从而引起衰退。所以,凯恩斯主张由政府干预经济,通过增加投资来刺激消费,以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在这里,一些学者常把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联系到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比如英国学者斯特雷奇曾指出,凯恩斯像马克思一样认为,要增加就业就需要扩大投资,而在这一过程中正是资本积累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所以,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也是“凯恩斯先生背后的战车。有趣的是,一位一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竟把利润率下降趋势重新确立为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⑪

这里强调的是,虽然凯恩斯反对劳动价值论,但他却采用了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以劳动为计量单位的作法。就像凯恩斯所说,“我欣赏古典学派以前的理论(注:指凯恩斯眼中新古典理论之前的古典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一件物品都由劳动生产出来,……因此,应该把包括企业家和他的助手的劳务包括在内的劳动当作唯一的生产要素,而该生产要素则在既定的技术水平、自然资源、资本设备和有效需求之下发生作用。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在货币单位和时间单位以外,为什么我们可以只把劳动当作经济制度

的唯一物质单位。^①可见,凯恩斯试图将工资单位和货币工资与有效需求联系起来。解释这一命题的关键是利润率,即当存在一个给定的自然利润率时,资本品价格及资本存量价值和货币工资率将同时决定;这说明,劳动价值论是与自然利润率的有效需求相联系的,显然这正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表明的。其实,在前面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性质的分析中,即可看到凯恩斯受马克思影响而形成有效需求波动理论的思想轨迹。例如凯恩斯在讨论货币工资经济(企业经济)时曾暗示,马克思讨论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时涉及的经济就是他所谈的货币工资经济。如经济学家考虑的是 $C-M-C$,而商人实际感兴趣的是 $M-C-M$;后一公式相当于马克思的资本流通公式 $G-W-G$,其中 M 与 M 之差 ($M-M$) 就是剩余价值的源泉。马克思认为,当 ($M-M$) 大于 0 时,社会商品不能全部被购买而有过剩,从而出现经济危机,使 ($M-M$) 趋向于小于 0,导致资本家亏损严重。对此,凯恩斯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真理的内核”,正如他批判地综合了马克思、马尔萨斯、道格拉斯少校以及古典学派的相关观点,得出了经济中可能存在 ($M-M$) 大于 0、等于 0 和小于 0 三种情况,而在 1920-1930 年代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其中 ($M-M$) 小于 0、即有效需求不足判断,显然这正是凯恩斯研究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②

不过必须承认,尽管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与马克思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凯恩斯的思想中仍然存留了他不能与新古典理论完全决裂的保守成分。就像学者达雷尔强调的,追随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凯恩斯研究的是自私的个人,并认为人们的偏好、消费倾向和对利润的预期都是既定的,这与现实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并不吻合。虽然凯恩斯与马克思在有效需求问题的某些方面(如利润率下降)是相似的,但总体上看,凯恩斯对危机和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的说明与马克思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凯恩斯对个人主义心理的强调是错误的。因此达雷尔指出,《通论》是一本与主观价值论相符的经济学著作,而不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因为它未能从根本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③与此对应,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斯威齐也通过引入制度和社会关系,指出了《通论》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肤浅。他认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加的失业、垄断增强、危机和国际扩张等现象的成功预言相比,凯恩斯理论对这些预言性内容的缺乏是他未能将制度变化融入其中而不可避免的结果。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凯恩斯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一个整合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技术和文化的总体,因而使他看不到有效需求问题引发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内在的和不可避免的趋势,

这显然是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要局限。^④

四、马克思与凯恩斯：总量关系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在货币经济背景下探讨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问题,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分析范式异于新古典理论的共同特点。在此基础上,两位学者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并体现了另一个与新古典理论完全不同的地方,即对宏观经济体系或总量分析方法的探讨。这一研究方法的采用,不仅使凯恩斯开创了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新的体系,同时也使得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能够联系到现实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体系的计量,从而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

提到马克思的宏观理论,很多人会想到社会再生产理论,其实这只是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揭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马克思将对宏观总量的研究贯穿于整个《资本论》始终,如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分配理论、资本积累理论、有效需求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经济周期与危机理论等,无不渗透着古典传统剩余总量的分析方法。不过,随着新古典主流地位的确立,很多学者都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总量关系的探讨。从 1896 年庞巴维克按照时间偏好的技术分析对马克思利润理论提出批评,以及 1907 年博特基维茨对马克思转形逻辑一致性提出质疑,到萨缪尔森和森岛通夫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马克思经济学提出批评等,都是从新古典相对价格的角度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并将其置于新古典一般均衡的框架下。然而,马克思的总量关系与新古典理论对相对价格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以《资本论》三卷为例,马克思强调的是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只为积累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种总量关系不取决于任何技术上的变动。相比之下,马克思对相对价格的论述在《资本论》全文结构中所占比例却是很小的,除了第 3 卷有关生产价格的解释外,只有第 1 卷第 1 章讨论相对价格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时有所涉及,但这一章的重点显然不在相对价格决定上,而在于表明价值和价值形式所表示的社会关系,如对商品拜物教问题的讨论;在第 2 章转向交换价值形式时讨论过交换价格,从“20 码麻布 = 1 件上衣”的成立取决于它们的劳动时间、然后过渡到货币,并在货币的买卖中得到资本主义的货币增值。可以看到,马克思只是以相对价格为引子,其目的是要说明货币的产生以及产生于货币关系中的资本主义总量经济关系。正如罗宾逊夫人所说:“区别马克思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完全不在于商品的相对价格问题,而在于资本的总供给量与作为整体的资本的利润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凯恩斯以前的学院派有着

截然分歧。^⑬

其实,总量关系与相对价格的区分也可联系到新古典学者对生产函数所作的解释,关键在于价值的计量是由偏好和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决定,还是取决于社会关系,同时也联系到凯恩斯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微观基础。实际上,就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言,无论是宏观经济的有效需求、货币与资本市场问题,还是企业组织和市场结构问题,都与经济制度有关或本身就是经济制度问题,即使是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这些看似接近新古典技术分析的领域也不能排除经济制度。一个突出例子是目前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新古典学者把这些统计变量作为技术关系中投入-产出的实物量值,但这些货币量值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实物量值是无关的,只是表示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的运行。比如,马克思的价值公式 $W = c + v + m$,完全可以把它与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作一个对比。其中, $(v + m)$ 是国民收入,并表示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比例;总产出 $(c + v + m)$ 则与GDP稍有不同,因为马克思的总产出包括全部资本存量的价值,而GDP包括的只是资本存量中折旧的部分。比如,现代的国民总收入通常指 $(v + m)$ 、以及 c 里面代表固定资本折旧的那一部分,而把 c 的其余部分剔除在外;所谓国民纯收入则仅指 $(v + m)$ 部分,它包括所有对个人的支付,再加上工商业公积金。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按照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来说明马克思的公式。在马克思的价值领域,收入 $(v + m)$ 作为全部劳动时间是可以加总的,对于其中的不变资本 c ,马克思采用“过去的劳动时间”来定义,这种定义由于排除了资本的异质性,从而能够和可变资本 v 加总在一起,得到一个按价值计算的统一的利润率。通过这个一般利润率,所有的异质品被加总为一组总量、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关系,而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如GDP、总资本、工资与利润等,作为一种价值形式,同时也就构成了现实资本主义竞争的形式或工具。

这里强调的是,研究总量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异质品的加总,即如何将不同质的物质产品加总成一个单一的价值总量。在新古典“两分法”的实物分析中,不仅异质资本品不能加总,异质消费品也不能加总为一个同质总量来表明实物产出的变动,这一点正是“剑桥资本争论”揭示的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逻辑悖论的根源。比如目前人们熟知的反映实物产出变动的实际GDP指标,不过是新古典理论创造的神话;因为实际上它们都像马克思和凯恩斯分析的那样是用货币量值表示的,由此计算的GDP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将与生产函数无关,只是表示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资本主义

关系的存在,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个部门统一的利润率,使得各种异质资本品或各部门的不同资本构成能够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同时,产出也作为一个同质的总量而比例于投入总量、并与利润率相联系。这样,经由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将能够实现加总,如马克思指出的产品同一性即在于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是劳动的凝结;而加总之所以有意义,也正是在于它们都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的劳动的产物,从而必须为资本家带来利润。这表明,经济总量的计算只有在一定经济关系基础上通过货币的计量才能获得加总的意义。

另外,联系到对GDP等现实国民收入统计的核算,马克思用统一利润率价值表示的各种总量及其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也是比新古典实物计量更适合的GDP统计依据。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体系了,不过却没有人真正从理论上考虑它的性质和意义。在这里,可以将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作为GDP等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或雇佣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⑭。由此,生产劳动这个定义就被看作是包含劳动力与资本相交换、及生产剩余价值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样,劳动转化为资本,并由“过去的劳动时间”来定义转化为资本的劳动量,也就是一个比以前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劳动量大得多的一个量值。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工人受雇于资本家或社会主义企业,相互之间进行的是市场交换,如工人在生产中消耗劳动力获得生活资料,资本家用货币资本以预付工资形式购买劳动力、并在生产中使用或消耗它来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在交换前后生产力创造的财富之间必定有一个差额、即增殖。所以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凡是与资本相交换、并能够实现价值增殖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而只要由生产劳动所得的国民收入经由了货币交易、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价值增殖,那么国民生产总值核算都是要计量的。其实,只要仔细考虑GDP统计即可发现,现实中以货币价值计量的GDP总量与实物的具体形式并无关系,因为GDP的定义并不是产品和劳务的总和,而是货币交易值的总和。所以,当把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作为不依赖于实物生产函数的价值系统时,马克思用价值概念表述的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问题,将直接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换句话说,马克思

的价值和生产价格概念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宏观经济体系,恰恰适合于以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与波动的分析,它完全不同于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研究实物经济的新古典相对价格理论。

同样,试图推翻传统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凯恩斯,在其 1936 年的巨著《通论》中建立起来的新的理论体系,正是在货币经济框架下使用总量方法剖析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次大胆尝试。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凯恩斯的“尝试”取得了极大成功,可以说“凯恩斯革命”几乎改写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它所建立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曾一度取代新古典理论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直至萨缪尔森 1948 年《经济学》首版问世的“新古典综合”。其间,经济学家们在凯恩斯范式的指引下开始了“常规科学”的研究,由此确立的宏观经济学作为与微观经济学并行的一门学科开始发展并繁荣起来。当然,如果说“凯恩斯革命”在研究内容上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那么凯恩斯在这一体系中将其确立的一系列总量概念与实际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紧密相连的做法显然是更有价值的。

实际上,在《通论》一开篇,凯恩斯就指出了他与新古典理论在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上的差异。“大多数论述价值论和生产论的著作主要既研究定量的资源如何在各种不同用途之间进行配置,也研究在使用这一定量资源的前提下,各种资源的相对报酬及其产品的相对价值如何得以决定。”^⑩在这里,凯恩斯精辟地指出,新古典理论只是一个研究既定资源有效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相反,他的研究正是要突破这种“既定资源”,而深入到如何提高国民收入来解决诸如资本主义失业和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在凯恩斯看来,一个社会的总产量、国民收入和就业量在短期中是大致等价的。这不仅因为短期内社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资料数量可以大致保持不变,重要的是凯恩斯认识到,当涉及总量时必须面对加总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则是新古典理论一直试图回避的。凯恩斯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产量具有不同的物质单位,为了表示由不同单位组成的总量(如一匹马加两只鸡蛋),就必须采用表示其价值的货币总量加以描述。比如他用价值的多少表示产量,这样产量的货币价值即是国民收入;而国民收入除以社会的平均工资(即凯恩斯著名的“工资单位”)就成为就业量。在短期中,如果假设工资和价格大体保持不变,则上述三个概念就会保持相同比例的变化,从而统一于凯恩斯的宏观总量分析。其中,国民收入的概念和性质是凯恩斯整个总量分析的基础。

如前所述,凯恩斯反对新古典将现实经济割裂为货币与实物的“两分法”,因而他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投资、储蓄等一系列宏观概念都是与货币经济相

统一的货币量值。显然,这种以货币量值进行的国民收入核算与实物统计完全不同。它首先是一种货币交易值的统计,即 GDP 是一个经济中全部货币交易量的增加值。如果用货币数量论的交易方程式表示,则全部货币交易量为 $MV = PT$,其中 M 为货币数量, V 是货币流通速度, T 表示交易的实物量, P 表示价格;而名义 GDP 的计算只是所有交易量的增加值,或从企业会计帐户上考虑的增加值。那么,当假设全部交易值与企业增加值之间保持一个固定比例,即 GDP 在 PT 中的比例稳定时,再假设货币流通速度 V 不变,则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或名义 GDP 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将保持固定的比例,即 $MV = GDP$ 。在这里,名义 GDP 的重要性在于,如果假设企业成本不变,则名义 GDP 的增加就意味着企业赢利的增加,而赢利的增加正是每一个企业经营的目的。就企业的成本-收益核算来讲,企业正是以货币价值的投入和产出进行计算的,而不涉及任何实物的考虑,显然这与凯恩斯货币量值的国民收入或 GDP 计量是一致的。在现实经济中,这种货币交易和获取利润的 GDP 统计对于讨论宏观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表明的,其收入与支出之所以相等,是因为它从不同角度看待双方交易,卖出者得到收入,购买者获得支出,同一笔交易必然使收入和支出相等;而其中的关键一点,则是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或获取利润。如果扩展到整个国民收入核算体系,那么除了物价指数所区分的名义 GDP 和实际 GDP、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其他所有统计变量如资本、折旧等实际上都是与实物无关的货币量值。由此,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来讲,重要的就是名义 GDP,而不是反映实物产出的实际 GDP,因为真正决定 GDP 的因素并不是生产函数和实物统计,而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在这里,凯恩斯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工资单位,他认为现实货币经济中对 GDP 的决定必然要联系到货币工资单位。比如在经济学中,要确切表示由不同单位加总的总量就要用表示价值的货币总量来描述,但如果出现价格波动,就必须对货币总量进行调整。调整的办法一般有两种,如用价格指数的办法使原有货币总量调整为以不变价格表示的货币量,或者用(货币)工资单位的办法使其调整为以不变货币工资单位表示的劳动量(或工作量)。这样,一件东西的真实价格就是它对所有其他东西的购买力;而名义价格则是纠正了货币价值变动后的价格。显然,凯恩斯采用了后一种做法,如他在《通论》第 4 章“单位的选择”中使用就业而非实物产出来界定真实收入,就表述了一种类似于古典学者斯密以“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表示的工资单位作为价值计量标准进行加总的方法。凯恩斯指出,为便利起见,“当我们论及总产量的增加时,我们所必须依

赖的假设条件是：在一既定量的资本设备下的就业量是一个合适的指标来表示由此而造成的总产量。^⑩在这一前提下，凯恩斯认为要研究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这种总量问题，就必须使用工资单位作为价值计量标准，以根据特殊劳动者的报酬换算劳动时间。通过使用一个工资单位、即对一小时普通劳动支付的货币工资率作为平减指数，凯恩斯获得了一种在总收入中事先给定一个不变工资份额条件下的收入与就业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果 E 代表工资（和薪金）总额， w 代表工资单位， N 代表就业量，即：

$$E = Nw$$

可以看到，这里的 E 是用货币数值表示的国民收入，工资单位 w 作为一种货币工资率而联系到货币对劳动的支配力，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货币化的表示。这样，通过把货币价值的量与就业量这两个基本数量单位联系在一起，凯恩斯用加总计量的办法表明了资本主义总量经济关系的货币性质。同时，也正是在这种总量货币关系的基础上，凯恩斯确立了其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相对价格理论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开创了现代宏观总量分析的研究范式。

1958年，新剑桥学派著名学者卡尔多依据多年统计资料，提出了著名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式化事实”，即：（1）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稳定的；（2）每个工人所使用的资本量、即资本-劳动比率是稳定增长的；（3）资本的利润率在长期是稳定的；（4）资本-产出比率在长期是稳定的；（5）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或收入分配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比率是稳定的；（6）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显著不同。^⑪可以看到，这些由统计资料显示的经验事实具有相当的规则性。以美国为例，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平均为3.4%。^⑫显然，这与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使用技术余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是完全不同的。这里的问题出在价值计算上。在现实生活中，各种物品之所以能够被加总为一个价值量、并与程式化事实相一致，其原因就在于所有产品生产的经济计算都是按照货币价值进行的，即所有劳动都是由资本家雇用的、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这样结论也是明显的，即这些统计事实根本不能用新古典的实物分析来解释。显然，上述程式化事实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一旦给定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将与收入流量的增长率保持一致，而收入分配中利润的份额将保持不变，正是这些“事实”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或货币经济的稳定状态模型。然而，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原理作为一般性技术分析，并不能表明这种特定经济制度下的经济问题；相反，马克思和凯恩斯利用

总量的货币价值或GDP概念所讨论的宏观经济问题，正是为了说明这种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经济波动和运行规律。

五、结语

经过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性质、有效需求问题以及宏观经济总量的分析，可以看到，马克思和凯恩斯对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描述，正是基于市场经济或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必然存在的“竞争”博弈规则而实现的。如果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讲，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消费；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产生了货币价值形态的成本-收益计算和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宏观统计变量。在实际经济中，这些统计变量只是为了特定的竞争关系存在，而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无关，因为新古典完全竞争的假设已从根本上排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或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但现实中显然正是这一市场竞争关系体现了人们行为的最基本特征。比如市场经济运行中经常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但在主流新古典理论中却看不到这些现象，因为其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性、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市场竞争的相互博弈。既然把这些现实经济的基本特征都排除在外，那么新古典理论也就不可能在解释现实问题时保持其逻辑上的一致性了。

按照著名学者布劳格的说法，主流新古典理论并不含有真正符合实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经验内容”。比如，在经典著作《经济学方法论》的最后一章“结论”里，布劳格通过列举多数学者对新古典理论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而遭遇尴尬境况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担忧。他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的10年里，经济学曾深受公众尊敬，经济学工作者春风得意，这一切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危机”、“革命”与“反革命”就已经充斥了街谈巷议，甚至远远超出了经济学专业中一些主要代言人的自我批评。比如德鲁克教授也曾不无忧虑地指出，“当前的‘经济学危机’乃是基本假定、范例、‘体系’的失败，而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失败^⑬”，从而点出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范式作为一个体系所面临的危机。所以，在引用了一些主流学者对其新古典理论自身的检讨之后，布劳格总结道，“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产生一种其内容明确地能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乐于使这些内容与现实相一致。”^⑭也就是说，新古典的理论体系总是不可证伪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著名“剑桥资本争论”，将

新古典的一系列逻辑悖论公布于众,由此引起的对斯拉法理论的讨论复兴了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将古典学者强调的社会关系直接联系到货币量值的国民收入核算,从而用以解决新古典异质品模型中无法克服的加总问题。综上,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与主流新古典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基于竞争的博弈规则,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殖,而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来自于资本作为一种预付、对劳动的支配这种特殊的资本性质。通过对货币经济背景下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关注,马克思和凯恩斯强调了资本主义总量货币经济的本质,并表明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根源。相比之下,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理论,只是将货币作为“面纱”加入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从而在“两分法”的实物经济中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同时,对资本主义竞争关系分析框架的远离,更使得新古典理论根本不能表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因此从范式意义上讲,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都是对主流经济理论的一次思维范式的革命,其后各自确立的经济学体系都通过对新古典理论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显然这正是其经济学革命之共同意义所在。

注释: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米克把这种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称为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传统。参见 Meek, R. L., 1977. *Smith, Marx and After*. Chapman and Hall, London.

凯恩斯这里所说的“古典学派”不同于马克思,它除了涵盖马克思所划分的从配第到李嘉图这些古典学者外,主要还包括了穆勒及穆勒以后的马歇尔、埃奇沃思和庇古等新古典学者。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7、7、37~38、366、305、109、220~221、8、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霍华德、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文版,第5章,“马克思与凯恩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⑲⑳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中文版,150、150、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中文版,3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㉑转引自刘杰敖:《国外货币金融学说》,326页,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㉒Keynes, M., 1973. *The Collected Working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 p. 89.

㉓转引自霍华德、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文版,9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㉔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文版,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⑩恩格斯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描述过这种失业造成的贫困化。

⑪Steilidge J., 1990. “Mr. J. M. Keynes and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Modern Quarterly*, 1, p. 106.

Moggridge, D., 1990.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3. Aldershot: Edward Eggar.

⑫一般认为,真正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与马克思相联系的是波兰学者卡莱茨基。1933年,卡莱茨基发表《经济周期概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人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正如卡莱茨基的名言所说,“工人花费他们所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所花费的”。比如在两个部门模型中,投资和资本品部门的扩张将使利润增加,而投资的增加会加大固定成本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与马克思和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分析是一致的。

⑬Darleir, J., 1987.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 *Science and Society*, 1, pp. 194 - 211.

⑭Sweezy, P. M., 1933. *The Present as Histo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 253 - 262.

⑮罗宾逊:《马克思与马歇尔和凯恩斯》,中文版,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⑰Kaldor, N., 1961.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F. A. Lutz and D. C. Hague, eds., *The Theory of Capital*.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pp. 177 - 222.

⑱参见《经济参考报》,2003-06-27,第2版。

⑲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见贝尔、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中文版,1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㉑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第15章,“结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参考文献:

1.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霍华德、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中文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 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罗宾逊:《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见《经济学论文集》,中文版,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8. 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1-4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9.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 Garegnani, P., 1984. “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Marx.” *Oxford Economic Papers*, 36, pp. 291 - 325.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N、S)